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4.008

“水土适应”的双重内涵:论《剑桥》中的奴隶制历史

池慧仪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水土适应”关乎在热带的生存与移居,标志着殖民主义的根本面向。卡里尔·菲利普斯的《剑桥》挖掘了“水土适应”母题的双重内涵,即殖民病学和丧失性流散,从后殖民逆写走向当代历史书写。小说首先将“水土适应”再现为殖民病学,揭示腐败理论、神经理论的两大范式是英国废奴辩论的病学基础,并构建反殖民实践从而逆写殖民话语。它更以僵尸叙事重构“水土适应”为丧失性流散,复现黑人族群的丧失,表达跨大西洋忧郁史观。尽管《剑桥》彰显“新奴隶叙事”的当代视野,却将奴隶制历史作为结构性创伤,暴露强化帝国叙事的政治局限。它也成为评估当代奴隶制书写政治意义的重要参照。

关键词:卡里尔·菲利普斯;《剑桥》;“水土适应”;奴隶制历史;忧郁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4-0054-07

英国加勒比裔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 1958—)以其沉郁、悲悯的历史书写蜚声文坛。他坦言自己在重述“同一个故事”^①,奴隶制历史正是其创作的核心关切。他的代表作《剑桥》(Cambridge, 1991)重返英国废奴时期,讲述了种植园主之女艾米莉·卡特赖特(Emily Cartwright)在加勒比某小岛的见闻与黑人剑桥(Cambridge)的为奴经历。不过,其中的奴隶制书写颇受争议,何卫华认为小说看似众声喧哗,实则暴露“新殖民主义”^②的政治无意识;尤吉达·戈雅尔(Yogita Goyal)则批评作者以跨种族共情消

解了历史的复杂性^③。学界从权力关系审视固然有其洞见,却忽略“水土适应”^④(Seasoning)的隐秘母题。“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适应了水土便安全开启热带生活……全然投身生产美洲蔗糖的日常商业。”这句话恰恰暗示着解读奴隶制历史的病学视角。“水土适应”保障殖民者与奴隶的身体健康,是种植园生产的先决条件,它指身体适应特定环境,尤其是“酷热地带”^⑤(Torrid Zone)所经历的疾病状态^⑥。

在英国文学中,“水土适应”是重要母题,关乎白人在热带的生存与移居:简·奥斯汀的《曼

收稿日期:2022-04-11

作者简介:池慧仪(1996—),女,广东广州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英美小说研究。

①Tuomi, Petra. “Prize-winning Novelist and Barnard Professor of Migration and Social Order, Caryl Phillips, Leads an International Life of Writing, Academics and Screenwriting”, *Barnard Campus News*. 26 July. 2021. <www.barnard.columbia.edu/newnews/news62000a.htm>

②何卫华:《〈剑桥〉:帝国叙事中的超越与共谋》,《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

③Goyal, Yogita. *Romance, Diaspora and Black Atlantic Litera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0, p. 236.

④“Seasoning”常与“acclimatization”(也写做“acclimatisation”,“acclimation”或“acclimation”)混用,后者指人为将动植物等有机体引入不同于原生地环境使其存活并繁殖,而人口移居与定居的殖民活动则称为“human acclimatization”(Livingstone, 359)。然而“Seasoning”是殖民病学的重要部分,特别关注殖民进程中人体对环境的有机适应。类似《三国志·吴志·周瑜传》的“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它指向环境影响论。取其文化共通之意,本文将“Seasoning”译为“水土适应”,其中“水土”泛指地域性的自然环境。参见 Livingstone, David. N. “Human Acclimatization: Perspectives on a Contested Field of Inquiry in Science, Medicine and Geography”. *History of Science*, 1987, 25(4): 359-394.

⑤酷热地带位于北回归线与南回归线之间。在欧洲殖民概念中,它以充足的日照和高温天气成为相对于温带(Temperate Zone)的气候他者。

⑥Seth, Suman. *Difference and Disease: Medicine, Race,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8, p. 5.

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 1814)制造了健康英国乡村与病态加勒比的文化对立;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Jane Eyre*, 1847)则描绘了居留过加勒比的欧洲人给英国带来道德败坏和疾病。然而,菲利普斯立足加勒比裔身份逆写该母题,探究其创伤面向:“水土适应”话语迫使黑人走上“丧失的航道”^①,它带来的是流散创伤而非有机调整。这在他的《高地》(*Higher Ground*, 1989)和《渡河》(*Crossing the River*, 1994)中也有所体现。不过,论及《剑桥》中的流散创伤,提莫西·贝维斯(Timothy Bewes)特别指出它不仅是主题或语境,还关乎文本的当代意义^②。因此,本文从“水土适应”母题切入,探究小说如何逆写殖民话语并发掘该母题的当代政治价值。《剑桥》发展了“水土适应”的双重内涵,即殖民病学和丧失性流散,从后殖民逆写走向当代历史书写。小说首先将“水土适应”再现为殖民病学,揭示腐败理论(Putrid theory)、神经理论(Nervous theory)的两大范式是英国废奴辩论的病学基础,并构建奴隶相应的反殖民实践从而逆写殖民话语。它进而以僵尸叙事重构“水土适应”为丧失性流散,复现奴隶从人到“非人”的丧失,表达跨大西洋忧郁史观。由此,《剑桥》彰显“新奴隶叙事”的当代政治视野,却将奴隶制历史作为结构性创伤,暴露强化帝国中心的政治局限。

一 自利之辩：腐败理论的变形与挪用

“水土适应”母题与英国废奴运动息息相关。小说设定在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至1833年废除奴隶制的历史时期,其中艾米莉的政治动向正是澄清语境的关键。她原出于人权平等反对奴隶制,后基于种植园见闻转而维护该制度:“仅仅出于感性谈论对这些人的买卖,却未透彻思考普遍的经济事实,这完全是愚蠢行径。”就此,作者暗中抛出事关“自利经济”和“同情感性”的废奴辩

题。废奴运动兴起的一大驱动力便是自利趋向和同情美德之间的博弈^③,主张平衡二者以发展高效率又符合道德的国家经济。不过艾米莉对废奴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暧昧态度更暗示读者大胆思考:二者或许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同气连枝。值得注意,其同一性为小说的“水土适应”母题所印证。小说首先重现“水土适应”的病学话语,说明废奴辩论以腐败理论、神经理论为病学依据。借此,小说质询殖民话语并以奴隶的反殖民实践探索抵抗的可能。

“水土适应”原本描述殖民者适应北美自然环境的过程^④,经由17、18世纪盛行的腐败理论发展为殖民病学,意味促成殖民主体改进自身和环境的疾病考验。腐败理论可追溯到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强调气候变化主导体液平衡的“体液说”^⑤,认为湿热的气候扰乱体液平衡令人体松懈,加速动植物腐败并产生有害的瘴气和沼泽。《剑桥》以医学话语重现了腐败理论,并通过种植园场景回溯“自利经济”辩题。由此小说揭示腐败理论为殖民话语的病学基础,并以奴隶的本土挪用进行抵制。

小说中医学话语标识疾病区域,并提出健康规约,这体现了腐败理论的影响。麦克唐纳医生(Dr. McDonald)将艾米莉的身体不适解释为高温引起的水土不服。山上的种植园大宅保持通风、遮阳和清洁,有利于殖民者远离腐败环境。腐败理论便认为欧洲人要到山地躲避高温,并绕开滋生腐败和瘴气的沼泽、树林^⑥。此外,殖民者通过合理布局、改变作息逐步适应热带气候。大宅配备躺椅、棋盘以及望远镜,便于人们避暑、监工和娱乐。他们需要调整生活习惯与饮食,“减少体液的容量与浓度”^⑦。医生建议艾米莉避免阳光直射,早晨九点过后不进行身体锻炼,也不能“饮用椰子水、麦芽酒或苹果酒”,如此度过“第一个

①Phillips, Caryl. *Cambrid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 156.(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②Bewes, Timothy. “Shame, Ventriloqu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Cliché in Caryl Phillips”, *Cultural Critique*, 2006 (63): 33-60.

③Davis, David Brion.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New York: Oxford UP, 1999, p. 46.

④英文单词“season”的法语词根“saisonner”指“使(木材)变得成熟和干燥”,自15世纪中叶“Seasoning”演变为描述殖民者适应北美自然环境的过程(Chaplin 151-152)。殖民者的身体如同从旧世界运往新大陆的木材,在舟车劳顿和开土中变得坚韧无比方能在未知的环境存活。人体与贸易商品共享能指,这为“水土适应”确立了殖民贸易的原初语境。见Chaplin, Joyce. E. *Subject Matter: Technology, the Body, and Science on the Anglo-American Frontier, 1500-1676*.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1, pp. 151-152.

⑤希氏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构成,并受季节、饮食和行为等影响而呈现干湿冷热的状态。

⑥Lind, James. *An Essay on Disease Incidental to Europeans in Hot Climates*. London: T. Becket, 1777, p. 227.

⑦Moseley, Benjamin. *A Treatise on Tropical Diseases on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on the Climate of the West-Indies*. London: Nichols and Son, 1809, p. 88.

雨季”便能逐步适应当地气候。

除了个体的健康规约,小岛上的种植园系统还赖以制糖业为核心的自利经济。这说明腐败理论是“自利经济”辩题的基本依据,并且暗示其种族、气候变量为奴隶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迥异调用。艾米莉转而为奴隶制背书,以生理适应性论证自利经济是必要性的,强化种族而非气候的影响。她认为现行分工合理,因为黑人比白人更适合热带的劳作环境,没有必要适应水土。种植园监工布朗指出,黑人的生产效率远超牲畜和机器,却容易受凉一病不起。奴隶主义将机体种族化,预设白人需适应高温,黑人则警惕低温。这在腐败理论中有依据,黑色皮肤能迅速排出热量和腐败物质^①,要克服凉快而非炎热的气候^②。奴隶主义者以此论证黑人的劳作优势,赋予种植园分工的生理前提。

小说中,自利经济不仅设定种族化适应目标,还要求家长式管理。家长式管理首先承认奴隶也需要适应热带气候。看似矛盾的是,艾米莉否认奴隶有必要水土适应,实际管理却作出让步,而这有其历史依据。受废奴运动影响,“自利经济”的讨论转而强调英国对非洲奴隶的道德与经济责任^③。废奴主义者借用腐败理论,强调气候对水土适应的主导作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将肤色、疾病、性情等归为四季变化和水土的影响^④,身体可自行调整至动态平衡。威廉·威尔布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突出气候的普遍影响,反驳了白人需适应高温,黑人则惧怕低温的说法,超过三分之一的奴隶正是在与非洲类似的气候下死于水土适应^⑤。面对质疑,奴隶主义者以家长式管理促使奴隶适应水土,自证大英帝国对落后种族的人道关怀。小说中,种植园为奴隶设

置专用小屋以适应热带气候,提供医疗服务与空余土地种植作物。如此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态”^⑥,以劳动换取生活保障从而发展种植园商业。自利经济的核心为道德经济,即“经济人需要的社会秩序应当容许,道德上正当个人自由以满足其自利的需求”^⑦。一旦“黑奴明了在主子的统治下他们过得有多自在”,便会努力劳作以改善自身的处境。这样一来,奴隶付出“恒常、稳定、并且从不间断的努力”^⑧,获得在非洲难得的生活保障。有奴隶直言:“要自由做什么……病了的时候,主人让医生来照顾我。”这些举措有其历史原型,比如詹姆斯·格兰杰(James Grainger)首次规范了黑奴的适应流程,种植园主应当提供充足食物和保暖衣物,减轻其劳动量,并预留至少一年的水土适应期^⑨;1798年英属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更是通过《改善法案》(*Slavery Amelioration Act*)优化加勒比殖民地奴隶的生存环境,规定他们享有经济权益和充足的衣物、食品、医疗供给。

尽管腐败理论是“自利经济”论战的病学依据,它也为奴隶挪用以扰乱种植园经济。“大多数数人(奴隶——笔者注)乐于刺激并保持旧的溃疡,制造新的伤口或使用自制的秘方,想尽办法偷懒。”甚至以叙事虚构疾病,治病用的蓖麻油也被黑奴拿去烹饪。“热带医生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黑鬼想象出来的怪异病上面。”可见,“水土适应”既展现自利经济的病学话语,也是黑奴的生存策略。黑奴对殖民医学的价值内化有意利用文化差异,并威胁规范化知识。他们将“水土适应”变形为主动患病的能力,利用殖民医学话语对抗种植园体系,谋取利益和闲暇。

①Seth, Suman. *Difference and Disease: Medicine, Race,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8, p. 276.

②Smith, Sean Morey. “Seasoning and Abolition: Humoural Medicin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tlantic”, *Slavery & Abolition*, 2014, 36(4): 684-703.

③Swaminathan, Srividhya. “Adam Smith’s Moral Economy and the Debate to Abolish the Slave Trade”,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2007, 37(4): 481-507.

④Hippocrates. *The genuine works of Hippocrates*. Trans. Francis Adams. New York: W. Wood and Company, 1886, pp. 190-203.

⑤Smith, Sean Morey. “Seasoning and Abolition: Humoural Medicin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tlantic”, *Slavery & Abolition*, 2014, 36(4): 684-703.

⑥亚当·斯密:《国富论: I-III卷》,谢宗林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⑦Davis, David Brion.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New York: Oxford UP, 1999, p. 46.

⑧亚当·斯密:《国富论: I-III卷》,谢宗林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0页。

⑨Grainger, James. *An Essay on the More Common West Indies Diseases; And the Remedies Which that Country Itself Produces*. London: Munnell and Son, 1803, p. 11.

二 感性之辩：神经理论的焦虑内核

神经理论于18世纪90年代取代腐败理论，成为“水土适应”的主流范式。它关注炎热气候对大脑的病理影响：湿热气候产生的腐败物质造成神经衰弱，加速血液流动导致发热。如果说腐败理论中“水土适应”意味着良性调整，那么神经理论则以其为病变甚至种族退化过程。关键在于，神经理论围绕“感性”（sensitivity）概念形成种族化病学话语，并介入“同情感性”的废奴辩题。小说重访感性议题，揭示神经理论与废奴辩论的关联，并从感性区隔和节制感性凸显双方对热带殖民地政治、道德失序的焦虑。依据神经理论，奴隶主义者区分感性的种族差异，暴露对身体与道德双重退化的恐惧。而双方的“同情感性”辩论都提出要节制感性，试图建设保守的政治道德，体现18世纪末的保守政治转向。由此小说反思废奴运动的政治道德，并以奴隶的感性叙事标记反殖民权力。

感性是“基于大脑和神经的有机感知力”，暗示着“敏锐的道德与美学感知”“精确的情感与肢体感受”以及“对微妙情感的易感性”^①。个体的神经结构越精细或松弛，感性愈是发达。依据神经理论，黑人由于颅骨更小，其智力发展受限且缺乏感知力^②，如动物具有刺激的（irritable）肌肉反应，而非敏感的（sensible）神经体验^③。艾米莉观察到他们“最为奇异强度”的情感表达并归结为“动物欲望”。他们对苦役和病痛有着惊人的耐受力，适合在种植园劳作。然而麦克唐纳认为黑人畏惧疼痛，却由于懒惰放任感染导致截肢。自相矛盾的反应体现着种族定型并戳破了神经理论的伪科学叙述。

而白人易感且脆弱，需要避免在热带的殖民活动威胁感性健康。一方面，他们应节制情感，否则会神经衰弱乃至丧命。艾米莉脆弱的神经在加勒比备受考验，因此“应当克制并掌控……情

绪”。另一方面保持敏锐的道德感知，防止种族退化与社会混乱。“动物历经数代能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人们移居热带，其后代却逐渐退化。”^④常年高温会造成肌肉纤维松弛，损害神经系统并破坏行动能力，滋生懒惰和享乐的陋习^⑤。“在这方水土，什么都可能发生。”艾米莉感叹许多英国人自甘堕落，终日游手好闲。医师建议避免接触女奴以防道德观退化，而布朗先生的朋友仍与女奴厮混，因感染“雅司病”（yaws）而身心痛苦。

此外，小说还通过艾米莉的节制同情主张引出“同情感性”的废奴讨论，并说明双方将节制从感性健康上升为政治道德。同情是利他的感性，它意味着“对任何激情的感同身受”^⑥。废奴主义者主张以同情解放主人与奴隶的人性并改进帝国道德。艾米莉一开始认可黑人更为“欢欣”的灵魂，期望自己的演说册子能召唤广大听众对他们受奴役的现状予以同情。随后却批判大多数废奴者滥用同情，实际“对这方水土一无所知”。监工布朗就指出，黑人并不苦于种植园劳动，而堕落的白人更值得同情。因此艾米莉的节制同情主张恰恰体现了保守的政治姿态，即避免废奴运动带来激进革命和帝国失权。书中种植园频发的奴隶叛乱似乎说明黑人皆是“假意奉承，偷鸡摸狗与凶残横暴”之辈。奴隶主担惊受怕，仿佛“狂风中诞生了一曲苦难的挽歌”，哀叹自己成为大英帝国的弃子。法国大革命的反雅各宾风潮、塔基叛乱（Tacky's Revolt, 1760—1761）和海地革命（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91—1803）等暴动为强调同情的废奴叙事蒙上反动阴影，促进废奴运动保守的政治转向。废奴主义相应强调对奴隶的同情意味着理性的行动而非激情，这在剑桥的废奴宣讲可见一斑。他指出一些英国女士拒绝使用西印度蔗糖，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道德改造。要节制感性，应以理性为中介，导向有序的政治变革^⑦而非

① Sant, Ann Jessie Van. *Eighteenth-Century Sensibility and the Novel: The Senses in Social Context*.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3, p. 1.

② Seth, Suman. *Difference and Disease: Medicine, Race,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8, p. 170.

③ Moseley, Benjamin. *A Treatise on Tropical Diseases on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on the Climate of the West-Indies*. London: Nichols and Son, 1809, pp. 492–493.

④ Johnson, James. *The Influence of Tropical Climates on European Constitutions*. London: Thomas & George Underwood, 1818, p. 176.

⑤ Moseley, Benjamin. *A Treatise on Tropical Diseases on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on the Climate of the West-Indies*. London: Nichols and Son, 1809, p. 114.

⑥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宋德利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⑦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On the Slave Trad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Watchman*, edited by Lewis Pat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70, p. 140.

激进革命。可见,在“同情感性”辩论中,双方看似立场不同,却都以“节制”在政治层面重申了神经理论强调的感性健康。在小说中,节制感性的要求不仅纾解英国对热带殖民造成种族、文化退化的恐惧,更将同情建构为保守的政治道德,避免废奴运动从根本挑战帝国的统治秩序。

然而,作者植入黑人感性,在文本层面对抗基于神经理论的殖民话语。他借由奥比巫术(Obeah)构建感性叙事,以证伪感性的种族差异并暗示基于流散医学的革命实践。克莉丝蒂娅娜(Christiania)由于食土等怪异行径,被指控受巫术蛊毒。然而巫术张扬着黑人独特的敏感性,即联系自然客体与主体的强烈情感。她仿佛幻化成昆虫蛇鼠,以身体语言传达不可名状的自然力量。此外,其感性叙事揭示革命的潜能。“奥比巫术”源于非洲的原始文化,经由殖民活动传至热带殖民地并发展为本土医学和宗教实践。奥比巫师熟识草药和土著秘方,代表着迥异于欧洲文化的流散医学。正如克莉丝蒂娅娜所做的,巫师使用猫耳、兽足、人的毛发、鱼骨等物件进行治疗,动用感性唤起对象的奇想与激情^①。小说结尾暗示克莉丝蒂娅娜突然消失与剑桥的杀人案有关,她可能动用巫术挑拨对方谋反。

三 文本症候:僵尸的忧郁回返

关于“水土适应”母题,《剑桥》不仅重现为殖民病学,还藉僵尸叙事发展为丧失性流散。小说揭露奴隶主义与废奴主义共同的病学基础,构建奴隶的反殖民实践,从而逆写殖民话语。阿吉兹·阿赫默德(Aijaz Ahmad)曾指出,后殖民逆写陷入对民族性经验的循环论证,而忽视包含阶级、性别、国家、种族等因素的全球性境况^②。然而《剑桥》不仅是对奴隶制过去的逆写,也是朝向当下的历史书写。它藉僵尸叙事将这一母题发展为丧失性流散,表达跨大西洋忧郁史观,建构其当代政治价值。从殖民病学到丧失性流散,小说推测奴隶制历史在跨大西洋乃至全球场域的展演,寄

托现实观照和政治反思。也就是说,小说以剑桥的僵尸叙事体现黑人族群从人到“非人”的丧失过程,构建跨大西洋忧郁史观。这反映了新奴隶叙事的当代关切,也暴露强化帝国话语的政治局限。

“水土适应”是“殖民的‘根本’面”^③。如果说艾米莉局限于殖民者的健康关切,那么剑桥的僵尸叙事则挖掘奴隶的流散创伤。小说以“僵尸”意象复现历史丧失,化用奴役和复仇内涵抵制回溯性哀悼,想象殖民客体共时、分裂的发生模式。剑桥被处死后,化为游荡在行凶现场的僵尸,成为历史丧失的具身。“僵尸”(写做 jumby/zombi/zamby)指“无身体的灵魂”或“无灵魂的身体”^④。如琼·戴安(Joan Dayan)所言,“僵尸的幽灵——失去自由、毫无灵魂的躯壳——是丧失与剥夺的终极能指”^⑤。该迷思起源于17世纪的非洲中西部,相信巫师施法让灵魂远渡异乡为奴或者复活死尸以制造奴隶,将奴隶制解释为“生理性存活和‘社会性死亡’”^⑥的非人状态。剑桥称奴隶为“可怜的黑色货物”,他们因环境恶劣而殒命大海,使得“中间航道”成为“丧失的航道”。这种丧失正是奴隶制造成的“社会性死亡”:既意味着肉体减损,更是“生来的异化”,即对原生文化记忆和身份的褫夺。

然而,僵尸受奴役的非人状态却有着复仇的民族主义指向。19世纪,僵尸文化作为巫毒教(Vodou)的重要元素直接介入海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承载被殖民者通过革命实现自由的梦想。在1804年海地对法国白人、克里奥尔人的种族灭绝中,屠杀者“让僵尸”(Jean Zombi)被认为是受巫毒操纵的僵尸^⑦。小说却未延续复仇传统,规避了狭隘民族主义。僵尸生性残忍并耽于复仇,“迫使路人跟随他们,甚至逃离种植园”,承载着黑奴“死后将回归非洲”的信念。然而剑桥的灵魂却在种植园终日彷徨,未曾返回故土。值得注意,民族主义往往以修通为政治目标,隐含回溯前

① Moseley, Benjamin. *A Treatise on Sugar: With Miscellaneous Medical Observations*. London: G.G. and J. Robinson, Paternoster Row, 1800, p. 193.

② Ahmad, Aijaz.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1994, p. 102.

③ 普拉提·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李尚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35页。

④ Lauro, Sarah Juliet. *The Transatlantic Zombie: Slavery, Rebellion, and Living Death*.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2015, p. 36.

⑤ Dayan, Joan. *Haiti, History, and the Gods*.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5, p. 37.

⑥ Lauro, Sarah Juliet. *The Transatlantic Zombie: Slavery, Rebellion, and Living Death*.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2015, p. 17.

⑦ Dayan, Joan. *Haiti, History, and the Gods*.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5, p. 36.

创伤状态寻求统一、连贯自我的逻辑^①。它认为历史丧失可以经由哀悼避免或修通^②，局限于同质化的自我和集体认同，容易走向“负面的种族主义”^③。另外，哀悼预设恢复过去和当下的界限，但创伤构型的过去仍然形塑着当下。菲利普斯曾表示，“非洲不能治愈，非洲不能让任何人感到完整，非洲不是精神医生”^④。

就抵制修通而言，文本表征了忧郁症候。剑桥魂灵显形正是文本作为忧郁主体的复现运作，承载了作者跨大西洋忧郁史观。文本内化丧失对象，通过操演使被压抑的丧失回返现场^⑤。僵尸的复现不是线性回返，而是共时存在。它既不是灵魂，也不是肉体，始终在显形中，超越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对立。从西非到西印度群岛，僵尸文化的传播轨迹吻合“中间航道”，揭示由殖民活动和奴隶革命推动的共时、断裂的现代历史结构。它有别于线性、进步的帝国史观。因此，奴隶制历史并非有着开端和结局的事件，却沉积为系统性日常暴力，渗入黑人心理结构，使其持续面临分裂与丧失。

进一步看，这种跨大西洋忧郁史观体现了当代奴隶制书写的历史关切和政治局限。战后移民浪潮下，为促进种族平等和融合，英国、美国分别兴起多元文化主义与黑人民权运动，“新奴隶叙事”应运而生。它以奴隶制为现代历史起点，核心在于当代视野，藉重述和政治构想进行伦理介入和现实变革。如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的《宠儿》(*Beloved*, 1987)，弗雷德·达吉亚尔(Fred D'Aguiar, 1960—)的《喂养鬼魂》(*Feeding the Ghosts*, 1997)，以鬼魂意象与循环叙事等体现奴隶的创伤记忆与边缘的政治地位，揭示共时、断裂的奴隶制历史结构。由此，在黑人奴隶体验，移民身份认同和跨民族主义梦想的彼此响应中，作家们以伦理视角重返历史现场，探索黑人文化和政治自主的可能路径。

然而，若将种族主义及奴隶制历史简化为结构性创伤，则易走向“必须与之共存”的妥协态度^⑥。戈雅曾反思“新奴隶叙事”缺乏强有力的抵抗书写而弱于政治施为力^⑦，《剑桥》便暴露这种政治局限性。其跨大西洋忧郁史观将奴隶制历史作为结构性创伤，强化人们为帝国话语的产物，却未探究其主观能动性，不免有消解斗争的妥协之嫌。寄希望于人们的具体实践，而非价值判断要远为艰难。《剑桥》最终走向晦暗前景，呈现冷峻的现实观照与政治批判。但在种族矛盾激化的21世纪，人们有必要铭记殖民创伤，亦需以日常实践寻求社会对话和政治突破，以期超越时代话语的强力规训，向着平等而非压迫的历史开放。

进入21世纪，无论是英美的系统性歧视，南非后种族隔离的分裂困境，还是全球性难民危机，都要求新奴隶叙事重审奴隶制遗产，在忧郁历史主义和后种族进步主义之间寻求黑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的新生^⑧。《剑桥》以其忧郁史观预先呼应了这种张力。它以“非目的和不完全”^⑨的后殖民哀悼打破忧郁历史主义。所谓“正常哀悼”以修通遮蔽复现，陷入追寻前创伤状态的忧郁历史主义。而忧郁“并非是……一种病态的哀悼形式，而是肯定性的……哀悼”^⑩。小说中哀悼止于复现，却未耽于怀旧，而是预见动荡的种族未来。千禧年，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似乎预示后种族时代到来。然而2020年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因暴力执法身亡事件，却重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风潮。严峻的种族形势说明奴隶制历史远未结束，而是早已固化为系统和制度上的日常暴力，似乎印证了《剑桥》中共时、断裂的忧郁史观。从被绞死的剑桥到弗洛伊德，都在重复着“我不能呼吸”的呼喊。无论是19世纪的奴隶贸易和殖民移居，还是21世纪的后殖民定居，黑人族群仍然循环着“水土适应”，

①Craps, Stef. *Postcolonial Witnessing: Trauma Out of Bound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31.

②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14, p. 65.

③Ahmad, Aijaz.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1994, p. 8.

④Phillips, Caryl. *The Atlantic Sou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0, p. 216.

⑤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14, p. 70.

⑥Craps, Stef. *Postcolonial Witnessing: Trauma Out of Bound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32.

⑦Goyal, Yogita. *Runaway Genres: The Global Afterlives of Slavery*. New York: New York UP, 2019, p. 24.

⑧Goyal, Yogita. *Runaway Genres: The Global Afterlives of Slavery*. New York: New York UP, 2019, p. 213.

⑨Bennington, Geoffrey. *Not Half No End: Militantly Melancholic Essays in Memory of Jacques Derrida*.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0, p. xii.

⑩Bennington, Geoffrey. *Not Half No End: Militantly Melancholic Essays in Memory of Jacques Derrida*.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0, p. xii.

经历从人到“非人”的结构性日常暴力。

结语

从后殖民逆写到当代性历史书写,《剑桥》围绕“水土适应”母题,对奴隶制历史进行了病学质询和当代重构,却未寻求具体的政治突围。尽管感叹“直面历史仅是徒劳”^①,菲利普斯拒绝从暴力、记忆和时间中漂移出去,以书写回望殖民病

学、奴隶贸易与流散创伤交织下的跨大西洋时空,从历史重负走向伦理、政治介入。奴隶制历史始终是菲利普斯的核心关切,也奠定其写作的忧郁底色,即重返创伤现场的具身姿态。然而,《剑桥》暴露了这种创作的局限性:它囿于结构性创伤而缺乏政治施为力。在21世纪愈发尖锐的种族态势下,我们需要重估其思想价值,兼顾伦理观照和政治现实,方能铺设变革进路。

Dual Connotations of “Seasoning”: on Slavery History in *Cambridge*

CHI Hui-y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Pertaining to survival and relocation in the tropics, “seasoning” marks colonialism’s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Caryl Phillips’ *Cambridge* excavates the motif’s double connotations of colonial pathology and diaspora of loss, thereby proceeds from postcolonial writing back to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With its representation of “seasoning” as a colonial pathology, the fiction unveils Putrid theory and Nervous theory as the pathological basis of British slavery debate as well as constructing anti-colonial practice. In this way, it writes back to colonial discourse. Via the zombie narrative, the fiction further re-configures “seasoning” as diaspora of loss to act out loss in the black community and to express historical view of transatlantic melancholy. Although *Cambridge* manifests contemporary vision of “neo-slave narrative”, it identifies slavery history as structural trauma and exposes political limits of consolidating imperial narrative. The fiction thus becomes an importantly political reference for evaluating contemporary slavery writing.

Key words: Caryl Phillips; *Cambridge*; “seasoning”; slavery history; melancholy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Phillips, Caryl. *The Atlantic Sou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0, p. 275.